

主编 ▼ 陈劲
副主编 ▼ 杨茂林
晔枫
杨必仪

GUANLI SIXIANG PIPINGSHI

▼ 杨必仪 晔枫 著

管理思想 批评史

——从外部性结构缺失看西方管理学理论短板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中国管理思想史论

GUANLI SIXIANG PIPINGSHI

管理思想批评史

管理思想 批评史

——从传统管理思想到现代管理思想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10月

经济社会

GL
SIXIANG
PIPINGSHI

▼ 杨必仪 晔枫 著

管理思想 批评史

——从外部性结构缺失看西方管理学理论短板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管理思想批评史：从外部性结构缺失看西方管理学理论短板 / 杨必仪，晔枫著.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4.4

ISBN 978-7-80767-762-8

I. ①管… II. ①杨… ②晔… III. ①管理学—思想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C93-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4989 号

管理思想批评史：从外部性结构缺失看西方管理学理论短板

著 者：杨必仪 晔 枫

出 版 人：孙志勇

责任编辑：李慧平

装帧设计：赵 娜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社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133（发行中心）

0351-4922085（综合办）

E — mail: sxjjfx@163.com

jingj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jjcb.com

经 销 者：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承 印 者：山西天辰图文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6

字 数：280 千字

印 数：1-1000 册

版 次：2014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67-762-8

定 价：36.00 元

总序

20 世纪 70 年代初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两种相互交会的发展方式均同时显现：一方面是具有引领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战略时代之功效的米都斯《增长的极限》，于 1972 年 3 月以罗马俱乐部第一份报告问世，它直接影响到联合国同年 6 月 5 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增长的极限》向世人发出忠告：“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 100 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在当时，这一震惊世界的警告，明确指出了传统发展方式的严重弊端。嗣后，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第二次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由世界各国首脑正式签署了《21 世纪议程》，自此，联合国官方为人类规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宏伟目标；另一方面则是 20 世纪 70 年代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滞胀，对此，凯恩斯经济学失去了它以往的效率，这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趁势崛起。新自由主义学说经 1978 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 1980 年美国总统一里根采用，先后成为两大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后又经 1990 年“华盛顿共识”，进一步发展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政府放松管制，并极力推行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推行与联合国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截然不同并且对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巨大威胁性的另外一种发展方式。

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虽然都出现于同一历史时期，但实践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导向，客观上已经严重阻碍了联合国为人类规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落实。即如老自由主义学说那样，新自由主义同样以市场经济“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主导一切社会经济领域。它不仅导致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而且严重破坏了我们的自然支持系统，使我们的地球支持系统日益不堪重负，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正是由于后者，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 1993 年就予以了严厉批评。戴利在《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一书中指出：“污染是成本递增规律的另一基础，但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关注，因为污染造成的成本是社会的。”同时他又说：“结果产生竞争性的、肆意浪费的开发——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称之为‘公地效应’，福利经济学家称之为‘外部不经济’，而我想称之为‘看不见的脚’。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使得私人的自利不自觉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看不见的脚则导致私人的自利不自觉地把公共利益踢成碎片。”另外，新自由主义主张不顾生态系统安全的所谓“经济增长”和“效率主义逻辑”。对此，戴利 1996 年又在他的《超越传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中进一步批评指出：“以日益增长的速度使用资源并损坏生命支持系统、不能满足所有人基本需要的系统不能被称为有效率的。”难怪德国学者库尔茨说：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连同盲目的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自认为已经“战胜”了国有资本主义之后，却在“资源的合理分配”（尤其是资源生态合理性配置方面——引者注）中彻底失灵。今天，环境危机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2013 年 10 月 17 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公布：室外空气污染致癌。这一消息令人十分震惊，现在已经发展到人们都不能正常呼吸空气的程度了，尤其是我国多地出现的十分严重的雾霾污染，不能不使人们忧心忡忡。

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仅仅需要有效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也需要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进行反思，并积极寻求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发展方式，寻求资源生态合理性优化配置的有效方法。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世界第二”的惊人的成就，但是也付出了十分巨大的环境代价。实践

中，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履行 1994 年国务院出台的《中国 21 世纪议程白皮书》中所强调的“绝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的老路”的承诺。加之新自由主义的风行，事实上已经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每个经济组织和个人的强烈逐利行为方面。其实，我国著名伦理学思想家蔡元培先生 1910 年于德国留学时所撰《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就曾批评指出：“惑于物欲，而大道渐以渐灭”，“于是人人益趋于私利，而社会之秩序，益以紊乱，及今而救正之，惟循自然之势”。另外，清华大学卢风教授在《现代性与物欲的释放——杜维明先生访谈录》一书《前言》中也指出：目前“现代性的价值导向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说它是错误的，是因为人没有必要通过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与人们幸福感的提高成正比。现代性误导了大众，使大众相信，只有一种实现自我价值和获得社会认同的途径，那便是努力赚钱，尽情消费。实际上存在多种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的途径……说它是极其危险的，是因为几十亿人的物质主义追求会使人类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用杜先生的话说就是，它使人类文明成了一列刹不住的列车，不扭转方向，它就会坠入毁灭的深渊”。今天，我们重温蔡元培先生的教导和阅读《现代性与物欲的释放——杜维明先生访谈录》，确实大有使人耳目一新和唤醒人的自然良知的感觉。我们急迫需要唤醒每个经济组织和个人的社会责任心，力求避免“经济人自身利润最大化”误导所导致的“异化自然”（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与哲学手稿》中批评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方式的理论观点）。力求避免“经济人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物欲主义追求造成的“外部不经济”，以及力求避免由之产生的加勒特·哈丁所说的“公地悲剧”。这种发展方式，即使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给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写的《前言》中也都予以了十分严厉的批评。

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了生态文明，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之中，这就充分体现了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自觉性的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达到了崭新的高度。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许多有着高度社会责任心的各界人士，主张反思现行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并再度重温 and 强调联合国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2012 年，山西经济出版社社长（总编）赵建廷先生和编辑室主任李慧平女士邀请我组织并主持撰写

一套《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思想文库》。根据要求，为了积极响应和落实中共十八大报告着重强调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规定，为了顺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同时也为了反思新自由主义风行导致的种种与生态系统法则相背离的理论问题，于是，我很快就对本文库进行了设计与论证。具体说，本文库由《经济思想批评史——从生态学角度的审视》《管理思想批评史——从外部性结构缺失看西方管理学理论短板》《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建构》《地方政府治理的创新——基于资源型省域的探索与思考》和《福利经济学派伦理思想评价——从生态正义角度的探析》共五本书构成。在山西经济出版社的积极争取和努力下，它被列为山西省重点图书。故此，借出版之际，特对山西经济出版社表示深切谢意！但是，写作过程限于时间紧促，难免有许多不周之处，还望学界方家惠予指正。



2014年2月于清华园

(总序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前言

管理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始于被泰勒创立的“科学管理”，算来不过短短百年时间，而管理作为实践则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未曾停歇。随着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管理理论也逐渐枝繁叶茂，形成流派纷呈的热闹景象。

一般认为，人类的管理实践由来已久，但是管理成为一门科学却肇始于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这时，管理在整合生产要素和促进生产发展方面的作用日趋显著，由于对管理的日益重视，管理研究也成为必要。而将之作为一门科学管理学加以研究，则最早是从应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开始的，它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即：①有效的技术、材料、组织职能和生产过程结合起来的组织问题与方法问题；②为了实现预想目的，如何促进、发展、激励和控制人的行为的人事问题；③为了实现目标，如何把前两者融合起来的问题。围绕这三个方面问题的解决，在实践中形成了各种管理思想和方法。

管理思想是人类在其生产经营活动中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有关有效组织、控制、计划与协调的各种观念、主张和知识。管理理论则是管理思想的理论化形态。

一、西方管理理论的类型和特点

西方的管理思想和学说，除了早期管理思想以外，从其产生的历史时期来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古典管理理论阶段，产生并形成于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第二是行为科学理论阶段，产生并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三是现代的各种管理丛林学说，产生并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一直持续至今。

这三个阶段理论，虽然产生的时期有先有后，后一类理论产生或盛行后，往往前一类理论并不因此而消失，有的甚至还在发展。各种理论和学派的产生同样如此，它们虽然同样有先有后，但是在其产生后却交叉并存，互相影响，继承和演变，进而形成各种思潮，故又出现了所谓“管理理论的丛林”之说。实际上，各个学派的理论分野主要在于对管理的本质是什么，管理理论和管理科学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以及怎样对管理展开研究这三个问题的分歧上。

作为理论化形态的管理思想，主要见诸各个管理学家的著作之中。因此，从管理理论著作者的角度看，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管理学著作主要是一些管理实践者的研究成果，而自50年代后，很多学者也开始进入管理研究者行列之中，并写出了大量新的管理学著作。在各种管理理论著作中，由于管理学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和主观认识方面的不同，内容上，有的侧重于组织理论和方法，遵循所谓“效率逻辑”，使并工具理性占了上风；有的则侧重于人，注重所谓“情感逻辑”，人的情感、道德和价值理性又在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管理学研究的重点主要从生产组织、技术方法方面转向对组织与行为的探索上，这使得高层管理或战略管理研究迅速崛起。面向21世纪，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外部竞争环境复杂化和组织规模扩大化的种种要求，管理学除继续沿着理论研究、应用探讨两条道路前进外，综合研究也得到了相应发展。

二、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轨迹

根据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对于工业革命之前的早期管理思想，本书只是在第一章作为历史管窥简略带过。这部分，主要沿着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供的思路，侧重分析了诸如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新教改革对“经济人管理思想”形成方面的影响。但这并非本书重点，本书重点在于着重从以下四个阶段系统阐述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并对其“外部性结构缺失”予以批判性分析。

（一）管理理论的萌芽时期（工业革命到19世纪末）

工业革命引起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同时也引起管理方式的革新和发展。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基本建立，以自由竞争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业已基本形成，管理问题也被引入竞争领域，技术进步和管理效率成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的两个重要因素。因此，此时管理的出发点更集中在如何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上。管理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既定劳动者充分发挥他们的体力，并使之在工厂主可以使用的范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抑或创造出更多的企业利润。在当时，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管理，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提高劳动强度，二是延长劳动时间；与之不同，另一些管理研究者则试图以合理分工、工资制度等物质刺激方式提高工人生产效率。在这一时期，亚当·斯密论述了分工问题和劳动报酬原则。欧文主张人道的管理方式，侧重于以人为本的管理，巴贝奇从效率和成本核算角度作了探索，麦卡勒姆在公司建立了组织、报告、会计和统计的管理体制等，这些探索均为后来管理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一时期也是“经济人理论”形成，并强烈影响管理“效率逻辑”的最重要时期。

（二）古典管理论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

古典理论主要指泰罗创立的科学管理以及此后以泰罗、韦伯、法约尔学说为代表的管理学理论形态。

在当时，泰勒面对的是工厂以单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事实上，这种管理在两方面受到挑战：一是工人的生理承受力的限度，另一方面是劳资双方矛盾激化，乃至导致激烈的对抗。故此当时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既能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不至于使劳资矛盾再度加剧。换言之，在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大劳动强度之外，寻求另一种提高生产率的途径。泰罗的“科学管理”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并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总体方向。

泰罗号召劳资双方进行“心理革命”，即以合作取代对抗；在衡量任务方面，以科学取代经验，并将科学的方法引入生产过程之中。在管理上，他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创造了一系列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与方法，如动作研究、定额原理、标准化原理、成本核算、计件工资制、计划和执行相分离、例外原则等；二是改变了人们对于管理的传统看法，即管理需摆脱简单依靠经验进行的传统模式，而用科学手段去探索工厂运作各个方面的规范、方法和技术，进而实行“科学管理”。实质上，泰罗把“效率”置于优先地位，即奉行所谓“效率逻辑”，并试图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增进劳资双方“共同利益”，但是他的“效率逻辑”从根本上说是为资本服务的，这也是作为古典管理学创始人之一的泰勒学说的本质特征。

与此同时，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从对权威的历史考察和分析入手，提出组织以权威为存在基础，并认为存在着三种支配组织的权威形态：传统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权威。韦伯进一步分析了三种权威支配下的组织管理、结构，及其

运转方式和功能等，这同样为大型组织中提高“效率”，推行“效率逻辑”提供了一种“理想官僚组织模式”，因而被称为“现代组织理论创始人”，其学说，也是古典管理学的另一组成部分。

在泰罗时代，法国的高级经理人员法约尔从高层宏观管理的角度，提出把企业的活动分为六方面：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管理活动。法约尔又把管理活动分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五种要素。他从管理的通用性角度又提出了 14 项管理原则：劳动分工、权力与责任、纪律、统一命令、统一指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人员报酬、集中、等级制度、秩序、公平、人员的稳定、首创精神、人员的团结。同时，法约尔还就管理教育提出自己的看法。除此，他的一般管理理论到后来逐渐演变为管理过程学派的理论框架，并为高层管理“效率逻辑”研究同样提供了理论依据。总之，泰勒、韦伯、法约尔均以各自的理论构成了古典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以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为主的时期（20 世纪 20 年代到 50 年代）

20 世纪 20 年代，组织中人的因素得到进一步重视，此时管理更多地从人的角度出发探索提高“效率”的途径。自美国学者梅奥主持的霍桑实验开始（此前帕累托对此问题已有研究，并受到哈佛大学亨德森教授的关注。后者因举办了“帕累托学术圈”对梅奥产生过影响），工业心理学、社会学方法在管理研究中得到应用，进而进入了行为科学管理理论阶段。后来，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

当行为科学的基因注入管理学理论研究之中后，更多地强调了工人对工作环境所做的积极反应，强调工人的社会关系对其工作积极性的影响，也强调了情感因素或曰“情感逻辑”问题。在行为科学角度看来，人的社会特性是决定人的工作状态的重要因素，因而需要从激励人的行为角度来提高工人对于工作的热情。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人际关系、个体行为与团体行为、个性与组织、需要层次以及行为激励等“人性假设”方面提出一系列管理学理论。与此相应，也形成了人际关系学派、群体行为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等。行为科学管理理论更注重“效率逻辑”和“情感逻辑”两种因素。这一点，相对于古典管理学是一个历史进步。对以后的领导理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学说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四）现代管理理论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多种学科方法的运用，管理学研究也从多角度展开。从切斯特·巴纳德开始，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这一时期流派众多，且均有各自的建树，管理理论的科学化程度也

在提高。

1938年,巴纳德的代表作《经理人员的职能》问世,他在韦伯的组织理论与梅奥的人际关系学说基础上,提出组织平衡论、协作系统论和权威接受论,并对组织管理理论开展了动态研究,巴纳德也因此被看作是“社会协作系统学派”的较早研究者。另外,此时美国女政治哲学家福莱特对冲突和团体心理进行了探讨,并做出了相应的研究成果。故此,可以认为,巴纳德和福莱特的管理学理论为行为科学转向现代管理理论起到了桥梁作用。后来,作为巴纳德的追随者,西蒙则在组织行为研究的基础上,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决策理论,并探讨了理性因素与心理因素在组织中的意义和作用,明确提出“有限理性”与“满意解”。与此同时,他还将管理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加以区别。在西蒙管理思想的影响下,决策学派也迅速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科学技术和新学科为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依据,这时计算机和计量方法也被应用于管理之中,使管理科学和运筹学得到发展。在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影响下,以卡斯特为代表的系统学派从组织与环境(与组织经营相关的社会范畴的环境)互动的角度展开研究,试图寻找以往各种管理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以卢桑斯为代表的权变学派则试图去寻找影响管理的各种变量因素之间的关系。在60~70年代,以戴尔、德鲁克、斯隆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对管理理论和实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本尼斯、西肖尔则对韦伯的理想官僚组织提出批评。80年代初,经理角色学派随之诞生。一些学者则又回到对一般管理理论、概念、原则、体系的探索之中,管理过程学派再度受到重视。

20世纪后期,面对信息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的风行及其所掀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国与国、企业与企业的竞争问题更加突出。企业的内部管理和对市场的适应性问题,也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态势,使管理理论研究和探讨呈现出一种新的时代特征。与之相应,在管理学上,主要出现了比较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理论、企业战略理论、企业再造理论、知识型企业管理理论等。这些新理论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管理思想宝库,也进一步促进了管理实践的当代特征——参与经济全球化前提下激烈竞争的特征。

三、对管理理论“经济人假设前提”问题的批判性反思

作为管理学,“人性假设”概念已经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逻辑前提。“人性假设”问题,对于管理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深入了解和把握西方

管理理论本质前提下，对其中有关“人性假设”方面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趋势进行批判性分析，将有助于人类最终选择符合生态合理性原则要求的管理学理论。

（一） 仅以“经济人假设”研究管理问题科学吗？

毫无疑问，“经济人假设”，无论在亚当·斯密市场原教旨主义盛行的原初意义上，还是在新自由主义盛行及经济全球化的当今时代，都有很大的现实性和解释力。但是，解释力的强弱并不意味着能够理所当然地证明其思想内涵的真理性。“经济人假设”存在着以下诸多问题：首先，它具有很大的肤浅性。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还要追求超验价值，而“经济人假设”将人看作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动物”，这只是对人的低级的、浅层本质的一种把握。正因为如此，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就曾批评指出：“经济人假设”所讨论的乃是人的低级本能，是一种对人本质亵渎的、类似野兽哲学的假说。事实上，这也正是对新老自由主义学说思想的一种十分严厉的批评；其次，它具有很大的教条性。“经济人假设”认为，对人的自利性的把握是万世皆宜的，但实际上人的自利性仅仅是在自然资源稀缺和社会利益分化这种特定环境中形成的，它并不能科学反映很多利他主义的事实；再次，它具有极大的片面性。经济利益固然是经济事物过程中人的主要追求，但它并非唯一追求。人固然有自利性的一面，同时也有很多利他性的方面。商人对利益的追求是“最大化”（这里是带引号的“最大化”，因为西蒙以“有限理性”和“满意解”批评了这一观点）的，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商人。

（二） 与“经济人假设”不同的“道德人假设”问题

“道德人假设”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其有道德性。显然，这就揭示出了人的重要本质特性。尽管“道德人假设”也有着忽略人性恶的方面的问题，但是，与“经济人假设”所不同，对“道德人假设”的强调，无疑有助于对人性的升华和人的思想境界的提高。尤其是在“经济人”为了自身无限度的最大利益，戕害我们的自然支持系统，导致马克思理论意义上的“异化自然”，庇古所说的“外部不经济”，以及加勒特·哈丁所说的“公地悲剧”的当今时代，不仅急迫需求，而且必须加强对它的重视。因为在“大自然报复了我们”（恩格斯语）的情况下，对它的重视，既有利于对新老自由主义学说和思想中“经济人假设前提”存在问题的反思，也有利于对“经济人”无限放大的逐利行为的遏制；既有利于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强调的社会公平的积极促进，也有利于对这一战略思想中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要求的追求。因此，有关“道德人假设”也是当今时代亟待倡导的理论问题。

鉴于以上的分析，本书认为，人的本性不只是追求某一方面的价值，而是

追求价值的全面性和总体性。尽管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人追求的各种价值之间的比重不尽相同,但事实上并没有单纯追求某一单独价值的人的存在。所以,与“经济人假设”所不同,人最终追求的其实是各种价值,是追求包括经验价值和超经验价值在内的现实的“价值人”。而且这种“价值人”的追求,既是普遍意义的,也是逻辑外延更为广泛层面上的。亦即它不仅包含社会范畴价值的理论内涵,而且包含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和《哲学走向荒野》中所强调的“自然价值论”理论问题。因此,在人性和价值问题上,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力求从“片面的深刻”走向“全面的深刻”,在已有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综合创新,从而力求提出一种既有理论自洽性又有现实有效性的新的“人性假设”管理学理论和概念。

(三) 西方管理思想发展史中“外部性结构缺失”情况

为了使管理学理论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时代的现实需要,本书在系统阐述西方管理思想史的过程中,也批判性地分析了其所存在的“外部性结构缺失”理论问题,对西方管理思想发展史的各个阶段因其“外部性结构缺失”所导致的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影响进行了审视。西方的大多管理学说,因其“外部性结构缺失”而不能与当今及未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相适应,这也正是本书之所以为什么从这一角度出发,批评西方大多管理学说的原因所在。故此,与本书主题思想:“从‘外部性结构缺失’看西方大多管理学理论的短板”相一致,对西方管理思想史的审视,是从庇古所说的“外部不经济”角度开始,并且以此贯穿始终。因为,从学理上说,西方管理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除了杰伊·福雷斯特的系统动力学,及其直接影响的米都斯《增长的极限》等管理思想和学说外,绝大多数管理学著述都是不涉足“外部性问题”讨论的。这种情况,客观上就造成了其学说建构过程“外部性结构”缺失情况的长期存在。理论上,如果没有对“外部性问题”进行审视,那么,它也必然不会产生与之相应的管理要求。这使之在对待外部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管理或实践方面完全没有了责任和义务。从这种意义上说,今天我们的生存环境之所以会在“经济人自身利润最大化”追求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以致到了难以修复的灾变状态,都与以往及现行管理学说的“外部性结构缺失”有很大关系。故此,本书系统阐述和梳理西方管理思想的过程,也是事实上批判性分析西方管理思想史中“外部性结构缺失”情况的过程。对该过程进行系统阐述和批评的主要目的,就是旨在要求管理在以往仅被视作为“经济效率”范畴的“神圣的科学”自此放下身段,“走向荒野”,积极关注我们的生存环境抑或自然支持系统的平衡、和谐与安全问题。就像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要求哲学放下身段,“走向荒野”,能够密切地关注我们的外部生态环境问题那样,管理科学同样理应如此。理论上,罗尔斯顿的《哲学走向荒野》和《环境伦理学》,已经为管理学思想的当代定向树立了标杆。因此,我们希望管理学理论研究也能够做出相同的工作,希望能改变传统管理学理论研究的惯常思维,突破被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亚当·斯密及新自由主义放大化了的“经济人假设前提”及其管理学说和思想的“片面的深刻”;突破现行“经济人”利己主义的思维定式,将以往视作“外部性问题”的生态环境的保护纳入管理学认知视野之中,使之在注重自身“经济效率”的同时,同样也关心我们生存栖息地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效率问题(或称“环境效益”问题),并积极向联合国《21世纪议程》所规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方向转变。这一点,正是本书的基本宗旨。

此外,基于上述阶段性特征及未来管理学发展展望,本书共分五章。其中,第一章“工业革命时代与古典管理理论的形成”。这一章除了阐述工业革命对古典管理学形成的直接影响外,还增加了对工业革命前管理思想,尤其是对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新教改革对“经济人管理思想”形成情况的简单分析。之所以如此,主要是顺着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供的思路,从发生学意义上探析新教改革与“经济人管理”思想形成方面的内在联系,它也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的宗教根源上的一种追溯。同时,在这一章还着重批评了古典管理学片面的“经济人思想”及其注重的“效率逻辑”而忽略庇古理论意义上“外部不经济”,及其结构性的理论短板。第二章“‘社会人时代’与行为科学理论”。系统阐述了这一时期管理学不仅对“效率逻辑”,而且对“情感逻辑”同时注重的时代特征,并肯定了其走向人性化管理的时代进步意义和作用。但是,即如“科学管理”所处的“经济人时代”存在“外部性结构缺失”的理论短板一样,这一章同样批评了“社会人时代”管理学研究的“外部性结构缺失”情况。因为,理论上,它并不涉及“效率逻辑”和“情感逻辑”之外的外部“生态逻辑”理论问题,因而,也是一种“经济人式”的内部性管理学理论。第三章“科技时代的现代管理理论流派和思潮”。这一章主要阐述了孔茨理论意义上“管理理论丛林”学说各自的理论特征及其“外部性结构缺失”问题。与此同时,又展开了对“走出丛林的道路”的“权变论”学说的相关讨论。如果说,在管理学上卢桑斯《权变管理理论:走出丛林的道路》是对孔茨《管理理论丛林》的批评,那么,本书第三章则又是对“走出丛林的道路”的权变论批评学说的批评!因为关键点就在于:权变论学说在环境“定义域”方面存在的理论问题,亦即它所说的“环境”仅仅指组织经营所涉及的社会范畴的环境,而与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

环境保护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故此,“外部性结构缺失”依然是权变论学说自身固有的问题。第四章“经济全球化前提下的当代管理思潮”。这一章主要讨论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管理学理论研究及特征。在这一时期,由于新自由主义的风行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管理学研究实际上是处于强烈的“效率主义逻辑”原地踏步。尽管也有诸如当代“文化管理思潮”等人性化管理的相关讨论,但本质上都是在为应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日趋激烈的“生存竞争”服务的。客观上,新自由主义不仅阻碍了联合国《21世纪议程》为我们规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推行,而且与之背道而驰。正因为此,才使我们的生存环境遭到了如此巨大的破坏,成了加勒特·哈丁早就明确指出的“公地悲剧”(庇古理论意义上“外部不经济”放大版的全球环境危机),以致就连空气都不能让人们正常呼吸了(2013年10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宣布:确定室外空气污染为新的致癌物)。由此可见,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外部性”理论问题,相对于管理学来说绝不是无关紧要,而是至关重要!如果说,今天的环境灾难与新自由主义的风行不无关系,那么,在管理学上,因其迷思于“效率主义逻辑”追求,而忽略遏制经济人“外部不经济”造成的极大破坏力,客观上也使之对“公地悲剧”同样难辞其咎!第五章“未来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主要介绍了与可持续发展相关联的一些管理学思想内容,具体包括:瑞士学者苏伦·艾尔克曼的工业生态协同管理、日本学者山本良一的“生态设计”和“三维管理方格”三个方面。旨在强调未来管理学理论研究,必须关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关的许多思想内容,否则,它将依然是残缺不全的一种学说。因此,我们希望管理能够像关心经济人自身“经济效率”那样,也同时关注其所导致的“外部不经济”情况,自此积极承担起保护我们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语)的社会责任!

作者

2013年年末